

《東華漢學》第 33 期；159-198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1 年 6 月

歸史於自然：  
從《博物誌》論董啟章小說的  
自然史書寫與香港寓言

李筱涵\*

【摘要】

當前多數關於香港作家董啟章「V城系列」與「自然史三部曲」這系列小說的研究，都聚焦於城市空間、歷史書寫和香港意識上。本文認為相關研究甚少提及的《博物誌》在體例與內容上，從人文史紀述轉向人物交融的自然史書寫，是作為上承「V城系列」下啟「自然史三部曲」的關鍵文本，應該是研究董啟章小說變遷所不容忽視的文本。

本研究將從生態文學批評視角，借鑑第四波生態相關論述及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哈洛威（Donna J. Haraway）、阿萊默（Stacy Alaimo）等學者概念，分析董啟章《博物誌》裡如何表現「環境、社會關係和人類主體性」三環相扣滲透的想像，藉由書寫「自然史」，投射對香港的環境觀察與未來想像。本文嘗試通過生態哲學觀點，詮釋董啟章如何從「地方誌」的寫作，轉向以「博物的城市自然」觀點來書寫香港史；分

---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析小說如何從古籍《山海經》、張華《博物誌》以來的敘事傳統提取小說養分，勾勒出一種既古典又後設的自然史觀，以回應香港的地方特質，建構一個打破現實秩序的自然史觀世界，寄託未來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關鍵詞：**董啟章、《博物誌》、生態書寫、自然歷史、香港文學

## 一、前言：從生態文學批評 看《山海經》到《博物誌》的知識想像與自然書寫

董啟章《博物誌》和生態文學可能有什麼關聯？若追溯董啟章「V城系列」幾本書名：《繁勝錄》與《夢華錄》明顯可對應《東京夢華錄》、《西湖老人繁勝錄》這兩部南宋城市筆記，內容同樣聚焦於城市庶民生活，從日常瑣碎鋪展整個城市的歷史記憶；呈顯高度繁華的文化，在消費頃刻奔向虛無。這是王德威所言的「夢華體」敘事，「就一座城市堆砌、羅列、感受各種物質生活的材料，企圖從最基本的感官經驗中，建立歷史想像，並一任有情的主體穿梭其中。」<sup>1</sup>延續此論述脈絡，「V城系列」《地圖集》副標「想像的城市考古學」，及小輯「錯置地」、「非地方」和「多元地」等名稱，皆已表明作者跳脫線性史觀的歷史想像；而作為壓軸的《博物誌》則更透過看似強調「物」的記述中，試圖批判以人為中心的敘述，抹除人文秩序，重新賦予人／物之間緊密的生存關係。然則，相較於《地圖集》（1997）、《V城繁勝錄》（1998）、《夢華錄》（*The Catalog*）（1999）；《博物誌》雖收錄他1997年至2000年的作品，卻遲至2012年才出版，<sup>2</sup>導致相關研究忽視這本能追跡董啟章敘事發展的關鍵文本。

董啟章在「V城系列」出版說明提及，他在傳統的寫法之外，試圖「開拓小說這個文類在知識內涵和情感經驗的可能性」，並思考「小說」如何成為建構世界的模式，以包含「香港的歷史和生存狀況」。<sup>3</sup>《博物誌》的撰述形式承接《夢華錄》，卻把人和物之間的關係更加寓言化，

<sup>1</sup> 王德威，〈千年華胥之夢：董啟章、孟元老「夢華體」敘事〉，《漢語言文學研究》第三卷第1期（2012.3），頁17。

<sup>2</sup> 董啟章作品出版年參閱《博物誌》附錄，董啟章，《博物誌》（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187-190。

<sup>3</sup> 同前註，頁9。

為其後「自然史三部曲」《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時間繁史·啞盜之光》裡人與物質相結合的科幻形象作了鋪陳。董啟章在《博物誌》後序寫道：「這個寫作源頭其實來自古典《山海經》的怪物世界和西方神話的人馬、人魚傳說，或者現代前期的機械人偶（*automaton*）想像」，更重要的是，他強調「我喜歡『古典』、浪漫主義兼黑色喜劇*automaton*多於科幻式的AI。」<sup>4</sup>這一古典小說敘事的取徑，提示《博物誌》的寫作模式可上溯至中國古典小說敘事傳統。李劍國將兩漢《括地圖》與晉張華《博物誌》皆列屬「地理博物體志怪小說」；並指兩書皆宗古今語怪之祖《山海經》，形式內容上皆有模擬的敘事承襲。<sup>5</sup>由此觀看「V城系列」首部《地圖集》和《博物誌》的命名和它們所指涉的敘事傳統，能看出董啟章至少有幾層用意，它不僅止於「夢華體」中對歷史的解構與重構；更有一種對於地理環境、自然生命和知識體系的思維角度，隱藏在此「志怪」書寫背後。《山海經》之「怪」，凸顯了當時人們對自然界未知的恐懼與想像，人們賦予它神話和宗教化的詮釋作為現實理解，並試圖作出歷史解釋。李劍國便指出「地理博物傳說」在內容和形式上，主要表現在「充分運用廣大空間觀念來建構幻想空間」、「並透過這種空間觀想像外邦異族在形體、特性的怪異」、「為了構築異域情調，雜取諸物嵌合為非馬非驢等異物形象」這幾個特點，<sup>6</sup>綜觀董啟章《博物誌》皆具體符合上述書寫特徵；最大的差異只在《山海經》所想像的「異域」是遠邦，然而董啟章的「V城」本身就是一個異邦，以「非人非物」的「怪」呈現出剝離現實的想像空間，並多重暗示指涉不在場的「香港」。清代劉熙載（1813-1881）說：「莊子寓真於誕，寓實於玄，於此見寓言之妙。」<sup>7</sup>而從《山海經》的神話，到董啟章以反思香港文史環境為意識，試圖以「志怪」來「志史」而寫成的小說《博物誌》；即

<sup>4</sup> 同前註，頁 184。

<sup>5</sup>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頁 5。

<sup>6</sup> 同前註，頁 82-85。

<sup>7</sup> 清·劉熙載撰、袁津琥校注，《藝概注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40。

見作者「寓真於誕，寓實於玄」的創作意圖，這使得董啟章《博物誌》的「志怪敘述」不僅在象徵意義上綁定「香港」本土歷史文化，同時隱含作者價值判斷的「寓言」特質。

生態學視角的文學批評，則能讓我們更聚焦於董啟章《博物誌》的文學，去分析他如何表現香港出「地方變動的生態環境」，及其對於香港當下環境的個人觀點；並更合宜的詮釋董啟章將《博物誌》英文書名定為 *Unnatural Re-collections* 背後所隱含的「自然史觀」與書寫企圖。蔡振興指出，早期生態文學批評特別喜歡研究「地方意識（sense of place）」，較貼近於觀察人和環境或生物及其棲息地的穩定和變化關係，重新在文學和文化領域探索有機體（人與非人）及其生存環境間的互動關係。就定義而言，「生態文學批評是跨學科的論述，主要將文學研究的範圍從人的層面擴展到非人，讓兩者展開對話與協商。」<sup>8</sup>到1990年代，生態和環境文學才被視為重要的文學研究而產生幾波論述建構，明顯可見過往靜態固定、單一的生態觀已無法滿足學者的生態知識建構。阿萊默（Stacy Alaimo, 1962-）提出「物質轉向」作為第四波新物質主義（New Materialisms）生態文學批評的基礎，該論述強調人類身體與（非人或自然）身體之間的連結、糾纏與轉換，將人類身體和自然身體之間的互動關係視為「跨身體性」（transcorporeality），而環境和物質皆影響著身體表現；環境與身體在此脈絡中互相影響而不彼此切割。<sup>9</sup>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與瓜塔里（Félix Guattari, 1930-1992）的後繼者班妮特（Jane Bennett, 1957-）也在這個論述脈絡強調情動身體（affective bodies）和環境互設所體現出來的創造性連結。<sup>10</sup>而第四波生態論述關注

<sup>8</sup> 據蔡振興爬梳，生態學（ecology）一詞最初由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Ernst Haeckel）在1866年提出，主要聚焦於「生物體與環境之間的研究」。而「生態文學與文化批評（ecocriticism）則遲至1978年才由美國學者魯克特（William Rueckert），始探討文學、自然和環境之間的關係研究。參蔡振興，《生態危機與文學研究》（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9），頁2-3。

<sup>9</sup> Alaimo, Stacy, *Bodily Nature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Self*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2010).

<sup>10</sup> Bennett, Jane,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and London:

的物 (things)、物質 (matter) 和客體 (objects) 在主體建構意義的過程中，思索在物、物質、客體和身體之間如何消解其物質性，又重新建構彼此的關係；這樣聚焦於關係性的研究視角，早在瓜塔里生前最後一本小書《三種生態學》(The Three Ecologies) 中，已有相關思維。這些論述正好與董啟章小說《博物誌》中所體現的人、物之間模糊的身體形象，和主客易位的主體化表述有所呼應；也反映出董啟章當下如何思考全球環境變動狀態裡，香港環境與港人生活情境，進而由《博物誌》構思其後長篇鉅製的「自然史三部曲」。

董啟章的《博物誌》書寫，在什麼面向上具有現代性和香港的現實意義？這得注意他提及的「自然史」回歸和「理想知識」的模樣：

作為科學研究方法之一種，博物學是另一大傳統文類。《博物誌》把「誌怪」嵌入科學圖鑑式的博物學體裁裡，又是另一種異質的結合，本身就是一怪。此怪之源頭，在中國是先秦時期的《山海經》，在西方是羅馬時期大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 AD. 23-79) 所作的《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那是個想像和知識還未分道揚鑣的時代。那也是我的寫作夢鄉之所在。<sup>11</sup>

董啟章小說裡「人與物」融合的現象往往被多數研究放置在「戀物」與想像未來科幻的脈絡詮釋。然而這篇作者自述卻顯示，董啟章對古典時期那種自然與知識未分，「想像」可以成為知識，甚至可以詮釋現實世界的現象非常嚮往，甚至作為他寫作的依歸，這點鮮少在董啟章小說相關研究被提及。綜觀目前學界研究主要可分為性別議題、<sup>12</sup>城市空間、<sup>13</sup>

---

Duke University, 2009).

<sup>11</sup> 董啟章，《博物誌》，頁 184-185。

<sup>12</sup> 梅家玲，《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 249-276。

<sup>13</sup> 趙稀方，〈香港：看不見的城市——讀董啟章的《永盛街興衰史》和《地圖集》〉，《文學評論》第 26 期 (2013)，頁 34-39；陳孟君，〈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臺大中文學報》第 48 期 (2015.3)，頁 161-213。

香港文化身份與歷史想像<sup>14</sup>等層面；這些論述視角各有著重的論題，卻難以突顯董啟章《博物誌》中關於「人、物、環境與自然」之間的命題。如何詮釋小說所呈現「人、物相混」的形象，故事斷裂時空的指涉，以及是作者如何用小說影射現實的有機思考，都還有相當值得探究的空間。

楊美琴在研究中發現，董啟章小說角色以人、物混淆的形式構成，認為董啟章以此作為打破現實和虛構的媒介，來超越身體限制。<sup>15</sup>但該文僅將「人」和「物」之間融合的形象視為「物的擬人化」表現，並未追問這種身體觀和「人一物結合」形象所透顯的人物關係，究竟構成怎樣的倫理世界觀。這樣人物與被形塑的小說時空之間，彼此有怎樣的有機關聯？相關問題，許維賢則以個人的情慾戀物癖（*Erotic fetishes*）和國家、文化的公家戀物癖（*Official fetishes*）來詮釋董啟章夾雜物質重述記憶的敘事特徵；他認為小說從戀物和拜物肯定了物質性。<sup>16</sup>林藍馨則延續「戀物」基礎，解釋董啟章小說的物史觀，指出自然史三部曲中善用物件流變緊扣時間，其實是以「物件為工具，突出香港本土意識和文明相依，並構築商品拜物教的物件歷史」，由此批判香港城市的消費主義，並指向文明世界的崩毀。<sup>17</sup>「物化」為「非人」在這些論述中成為時間殘敗的具體見證；「物」成為搶奪人類話語權的可怕結果。然則，董啟章的小說真的以「物」奪去「人性」嗎？前述論者並未

<sup>14</sup> 洛楓，〈歷史想像與文化身分的建構——論西西的「飛氈」與董啟章的「地圖集」〉，《中外文學》第二十八卷第10期（2000.3），頁185-204；鄒文律，〈論董啟章《V城繁勝錄》對「香港文化身份」的建構與思考〉，《人文中國學報》第17期（2011.9），頁465-489。

<sup>15</sup> 楊美琴，〈論董啟章小說中的物件人格化現象〉，《國文天地》第二十九卷第8期（2014.1），頁37-42。

<sup>16</sup> 許維賢，〈黑騎士的戀物／（歷史）唯物癖：董啟章論〉，「第二屆北京大學中文系與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聯辦研究生學術報告會」。香港：北京大學中文系與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合辦，2007/5/29。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 Working Paper Series 研究報告系列第64期（2007.6）。

<sup>17</sup> 林藍馨，《想像世界的宇宙獨裁者——董啟章小說研究》（臺北：國立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頁90。

重新思考人／物關係中，以人類的主體退位，以及與物互為主體的動態可能。

這個以「物」反串人類主體的結論，在鄒文律〈人與物件的時光之旅——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物（家）史書寫〉有部分修正，該文把《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放回香港回歸時，興起的家史書寫熱潮，觀看它的文學史位置；提出董啟章小說在消費物質之外，描述這些「獨特物」背後的敘事意義。人與物實際上已超越「戀物」層次，轉為雙向附屬、融合依存的关系，這其實是一種「共生」模式。在這部講述人與各種物件相交的小說裡，「自然」更貼近「人工自然」，因此董啟章的「自然三部曲」指涉一種非前現代，面向現代的「城市自然」，並以「物」作為記憶歷史的媒介。<sup>18</sup>這提示我們在「戀物」的詮釋觀點之外，小說文本裡「人物混生」的現象，可能隱含著某種作者看待自然「人—物關係」的未來想像。

董啟章曾在《博物誌》後記提到自己想寫一本《怪物大全》，這些人物相融合的「怪物」在他的定義是這樣：

我心目中的「怪物」，永遠是異質事物的混合體。人本身的狀態其實也不是單一的，而是異質的，所以人本身已經是我想像中的典型「怪物」了。故事中的「人物」，往往是人和物的結合，又或者物在人中、人在物裡，人和物互為表裡、互即互入。人永遠不是純粹的主體，而物亦不可能是單純的客體。<sup>19</sup>

換言之，我們應從「人和物」的關係史去重新理解董啟章小說裡關於「城市自然」的邏輯，以及從新思考「人、物和怪物」彼此互動的寓意。翁菀君就曾以「循環時間觀」談董啟章小說特色；它會通過不同時空體的碰撞與抵銷，畫出一個人為世界和自然交接處的邊界地帶。<sup>20</sup>而

<sup>18</sup> 鄒文律，〈人與物件的時光之旅——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物（家）史書寫〉，《政大中文學報》第16期（2011.12），頁231-268。

<sup>19</sup> 董啟章，《博物誌》，頁183。

<sup>20</sup> 翁菀君，〈逆轉時間繁史的永劫回歸——談董啟章小說中的循環時間觀〉，

這種變動與混雜的時空觀，不僅打破理性的社會秩序，也凸顯董啟章試圖以小說面對香港城市「現代自然」所產生的生態想像。

本文認為若從生態哲學切入思考，借鑒瓜塔里《三種生態學》的思維視角分析，應能處理部分問題。該書反省人們過往將理性與感性二分的理論思維，瓜塔里指出，現代社會已進入一個經濟市場全球化、大量數據、機械和電腦科技大幅改變人類生活的狀態裡，人們生存在這個時空，已難分割人類主體、社會關係與環境三者之間的關係。他提出一種生態哲學概念，同時考慮到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心智生態學（mental ecology）以及環境生態學（environmental ecology）三環相扣的觀點，認為唯有透過跨領域及哲學意義上的「主體化過程」，打破主客體分野，強調共生（living together）的重要性，才有辦法真正理解此刻人們生存環境真正的狀態。<sup>21</sup>這個觀點要討論對象正是動態的「主體化過程」，而不是決定主體在哪一方。重點在於，如何由異質元素組織的聚合物生存狀態，提出開放性的生態系統思考，而非鞏固相異物之間彼此的較勁。同時他認為，藝術創作的想像更有利於這種思維模式的實踐，<sup>22</sup>故本文借鑑瓜塔里這種混生的生態哲學思考，分析董啟章小說《博物誌》反映出人物共生主體化的現象，及各種異質關係之間的敘事美學，並以此詮釋作者如何藉由想像勾勒出人、物主體變異，將「香港史」從被官方寫定的歷史中解放，創造出另一種想像的「自然史」，打開與其他異質生物共生發展的可能性，從中寄託未來。

---

《字花》第 50 期（2014.7-8），頁 125-128。

<sup>21</sup> Félix Guattari, translated by Ian Pindar and Paul Sutton. *The Three Ecologies*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5), pp.36-42.

<sup>22</sup> Ibid. p. 35.

## 二、以「誌」為名： 《博物誌》化用的書寫傳統和敘事特徵

本節追跡董啟章《博物誌》的書寫形式承繼哪些傳統，而又轉化哪些部分和香港文學脈絡相連。以系列的整體性來看，董啟章從《地圖集》建構出一個虛構地景之後，《繁盛錄》與《夢華錄》則是以筆記體的「紀錄」去填充被想像的V城空間。董啟章寫《夢華錄》「從一開始，這批故事就在古人筆記『夢華錄』的概念底下寫出。」<sup>23</sup>即使早年在香港出版，以*Catalog*為名，也沒有拋棄「錄」的概念。而《博物誌》在這個脈絡裡，即使上溯《山海經》到張華《博物誌》以來的敘事傳統，也同樣隱含著「紀錄」性質。但無論是筆記、筆錄、記、誌（志）之類的文體，都指向經驗記述，作者要訴諸某種記憶的存在價值；而援用《博物誌》敘事傳統則強調了特定地域的想像性質，這兩種特性都成為董啟章書寫香港歷史記憶的資源。

### （一）以「誌」為名的香港敘事脈絡與歷史想像

無獨有偶，香港作家除了以大量故事新編作為文學創作中「史」的追尋之外，也以「誌」作為體例來記憶當下的香港。西西的〈浮城異誌〉和黃碧雲的《後殖民誌》在書寫形式上明顯展現這種特徵。兩人的寫作裡都記述一些片段、零碎的東西，以或虛或實的敘事手法傳達他們對香港的感觸記憶。董啟章的《繁盛錄》、《夢華錄》和《博物誌》雖然同樣回應這個「述史」傳統；但在內容和形式上最相似的反而是《夢華錄》和《博物誌》，兩者皆以「物」為篇名，記載大量繁複的物。差異在於《夢華錄》裡的「物」雖進入人的生活，但「人」卻還沒成為「物」，而且主要以流行消費的「物」為中心去描述某種特殊類型的「人」。最

<sup>23</sup> 董啟章，《夢華錄》（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283。

關鍵的差異在於《博物誌》呈現更多有生命、有機質的「物」，或可說是「人性化的無機物／物化的人」。也就是，此時董啟章的小說開始出現「物與人」合體的「怪物」，消彌了人與物之間主客的界線。

我認為從《夢華錄》走向《博物誌》，正反映著董啟章嘗試擺脫「物」只在消費層面的敘事意義，轉而思考「物」如何以滲入人類環境，甚至改變人類生活模式的形式。他彷彿重新看待「人與物」和「環境」之間，將它們都平等放置於現代環境的變動狀態。如果香港的一切都像西西〈浮城〉所顯示的浮動而不可預知，勤勉於記述各種瑣碎流行物的「錄」與「誌」，還有什麼意義？董啟章在《夢華錄》後記寫道：

在這樣的物欲洪流中，不一定一切都是過眼雲煙。這當中涉及一種「物品的個人用法」，也即是把大量生產的、無個性的、非人化的商品化為己用，成為獨特的生命體驗印記。寫到每一件商品時，用的也是異常的，甚至是荒誕的聯想方式，目的是顛覆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既定邏輯，重新把消費品還原為「物」，並賦予它情感和經驗的意義。<sup>24</sup>

把消費品還原為「物」這句話看似矛盾，但若對應於董啟章《博物誌》後記所言，他嘗試把「人和物的關係推到更想像性和寓言性的層次」<sup>25</sup>的意圖來看，「物」的敘事層次就有了轉變。王德威把「V城系列」放在一個香港回歸的招魂脈絡，以「夢華體」的詮釋視角，將香港視為一個「慾望與夢想錯置的空間」。<sup>26</sup>的確在「V城系列」前幾本小說中，仍能明確感受到，小說的敘事聲音是「以人為中心」的主體主導。但當時《博物誌》尚未出版，而董啟章的《博物誌》或許還保留前幾部夢與想像的敘述特質，但「人與物」的主客體已產生各種混雜的錯位，彷彿不再是通過「物」來招魂，而是朝向「與物同體」的生活狀態。作為人們記憶時代的「物」，是作者面向未來生活的變形。因此，這個「夢華體」

<sup>24</sup> 董啟章，《夢華錄》，頁 281。

<sup>25</sup> 董啟章，《博物誌》，頁 183。

<sup>26</sup> 王德威，〈千年華胥之夢：董啟章、孟元老「夢華體」敘事〉，頁 14。

終究要面向未來，而董啟章從古典小說的敘事傳統裡，找到博物思維，作為架構小說新世界的路向與途徑。

## （二）香港《博物誌》：以「博物」思維重構「香港史」

為什麼董啟章要以《博物誌》為名？就前述所言，本文認為這是董啟章試圖透過小說建立起「知識和情感經驗」互融的敘事文本；同時要顧及香港言論逐漸縮限的環境中，採以寓言形式書寫香港歷史和當下環境的敘事策略。從《繁盛錄》、《夢華錄》皆可見其書與前作不僅都以筆記體行文，在面對一個繁華城市的時空消逝的心理，也有其應對；顯然在「V城系列」選擇以「地理博物學志怪化」的《博物誌》為該系列收尾的書名，應有其寓意。當董啟章V城系列寫到最後一本的時候，他認為這種筆記式的小說已經來到強弩之末，短篇文體能夠承載意義和時代性的能力達到極限，此後應該從事架構長篇。<sup>27</sup>換言之，《博物誌》作為短篇小說集「V城系列」和長篇小說「自然三部曲」承先啟後的關鍵點在於，董啟章在這部作品裡，開始思考發明一種圍繞在「古典、現代與自然」和「人物關係」之間，以其統合構組「城市史」的可能性。「V城系列」開篇首本《地圖集》原名《地圖集：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考古」意味著從過去的殘骸想像一個城市可能的樣貌，在董啟章的小說書寫，無疑是從塑造歷史中去想像未來。<sup>28</sup>

張華的《博物誌》作為一種小說體裁和敘事傳統，它提供董啟章什麼書寫資源？李劍國指出，地理學和博物學受到宗教方術、陰陽五行學與社會文化心理的發展影響，使得地理博物學產生志怪化敘事的傾向。此外，春秋戰國時期，士階層知識份子大量增加，文人以建構知識的概念，廣記述各種地理博物物的奇聞，作為歷史補述之外，也形成地理博物

<sup>27</sup> 董啟章，《博物誌》，頁183。

<sup>28</sup> 從安維真作系列書序〈為未來而做的考古學〉也可見證這點。見董啟章，《博物誌》，頁3-7。

的志怪傳統。<sup>29</sup>在這個體系中，張華《博物誌》仿《山海經》而作，天地日月、四方人物和昆蟲草木無不備載；但它更記載了許多故事性較強的傳說，這種書寫特徵使它被胡應麟歸為雜俎，<sup>30</sup>形成雜記體「志怪」的特徵。再看董啟章的《博物誌》，全書為「異地」、「異人」、「異物」、「異事」和「私事」幾輯；形式上大致可對應於張華《博物誌》卷一《地理略》、卷二《異人》、卷三《異獸／鳥／蟲／魚／草木》和卷七《異聞》、卷九時《雜說》。但有一點值得分梳的是，在張華《博物誌》體系裡，所謂的志「怪」是跟著「異地」而來的地理區隔，從而產生的奇怪想像；可是董啟章的「異」卻生自香港。

在什麼意義上董啟章的《博物誌》可以從香港本土生出一個未知的空間，作為一種「異」的志怪表述？以「博物」的方法思維香港，能照見什麼社會和文化現象？張華《博物誌》承繼儒家「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的知識傳統；從《山海經》以降的「怪」顯示巫術觀念，<sup>31</sup>人們以「博物」統合這兩大傳統構成對世界的認知，就這個意義上，這個敘事脈絡裡的「物」不僅已脫離物質範疇，也指涉當時人類現有知識體系中，某些無法解釋的「異物」（可能是物魅、精怪之類），並提供一種想像世界的認知模型。這當中人對「物」的崇拜與敬畏，在董啟章小說從「戀物」轉向將「物」作為一種與人互為主體的關係想像，也有深刻的呼應。此外，「博物思維」的書寫傳統也和帝國疆域的想像相

<sup>29</sup> 李劍國研究唐前小說，指出地理學和博物學在西周春秋產生，但由於交通不便，地域區隔形成知識有限的認知差異與宗教觀的影響，加上後來方術、陰陽五行學與社會文化心理的發展，使得地理博物學產生志怪化的傾向。此外，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士階層知識份子大量增加，有一些文人是以建構知識的概念，廣為網羅各種地理博物的奇聞，作為補述地理博物的知識之一；除了反映人們普遍的好奇心理，也形成地理博物的志怪傳統。參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頁 66-72。

<sup>30</sup>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諸論下》曰：「博物。杜陽之祖也。」是把它和記載唐時雜事、遠方異珍的《杜陽雜編》等同視之。參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0），頁 375。

<sup>31</sup> 葛兆光，《思想史課堂講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5），頁 164。

關，<sup>32</sup>關於方志、地圖的政治意涵，就能牽回董啟章「V城系列」開篇的《地圖集》，視為前後貫連的整體。更有意思的對照在於，因為政治局勢分裂造成地理開發而促成「異物志」書寫，在六朝分裂時期大為盛行；「V城系列」的背景設定在回歸前後的香港，將「V城」置於一個政治分裂未明的局勢，回歸中國也掩蓋不了英國殖民留下來的異質痕跡。這樣像物一般被歷史決定、拋擲的香港與港人，註定要處在一個未知的「浮城」面對自己的「怪異」而與未來自處；如何從內在的異質文化透過不同的「物」發出多元同體的異音，去構成小說能夠完成的「香港史」，正是董啟章透過《博物誌》一書所要建立的方向。

### 三、「以怪為自然」的現代人文想像： 《博物誌》社會、心智與環境互涉的世界

因此「怪」才是「V城」日常，它是構成香港歷史記憶的「城市自然」。唯有以這樣的文化背景去詮釋小說，才能切進董啟章小說世界背後的書寫邏輯；也更易於理解他以《怪物大全》重構香港環境的思考意涵。本節將分析《博物誌》如何透過取徑自然敘事的人物書寫，以文本呈現「社會、心智和環境」之間的連動關係，構成香港的現世寓言；並詮釋作者如何延續此思維模式，架構其後「自然三部曲」的概念。

《博物誌》中「異地」、「異人」、「異事」、「私事」四輯裡的文章全以「動植物」命名，只有「異物」一輯以現代生活用品為題名。為這個想像世界定錨的「前言」〈影樹〉很值得注意，從「晚上的大白天」、「燒光的葉子卻重新長出」、「如此生生滅滅，輪燒不盡」、「然而彼是此，我無從確知」<sup>33</sup>等句可見，小說塑造了一個打破二元對立，模糊個體邊界，以及不斷循環的時間觀。形成這種幻覺的關鍵在於：「其

<sup>32</sup> 許聖和，《「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系碩士論文，2006），頁171-183。

<sup>33</sup> 董啟章，《博物誌》，頁19。

實火在我自己的眼裡。不是我的目光追隨著火，而是我的目光使我所注視的樹燃燒。然而不是彼是此，我無從確知。」<sup>34</sup>這裡前三句彷彿有一個明確的「我」作為推動事件的主體，但最後兩句把前者推翻，變成一種互為主體的相生關係。也是瓜塔里生態哲學裡強調的「主體化過程」作為故事或事件本身，因此主客體之間的關係就不會固定確立，而保持在同時發生的對等關係。題目〈影樹〉則暗示著，這個「樹」只存在於目光所及的光影燃燒處；後「異地」、「異人」、「異物」、「異事」、「私事」都在這種基調裡展開敘事，就像某些歷史機緣所促成的「V城」，事件本身就構成「存在」。

### （一）「V城」之「怪」：「怪異」敘事的香港空間隱喻和生態自然觀

首先從「異地」收錄的篇章，看文本構設出怎樣的「V城」環境生態。雖然篇名皆以自然物命名，但小說空間卻有明確的「城市性格」。如瓜塔里強調，這個時代的「自然」無法離開人為文化，為了理解整個生態系統、社會和個體之間的參照與相互作用，我們必須橫向思考；<sup>35</sup>原本以「社會、心智和環境」為劃分的三種生態系看似有自己內部運作邏輯，但許多時候，它們仰賴某些事件發生，彼此參照存在。他以《追憶似水年華》中瑪德蓮的味道、教堂鐘聲來分析文學如何表述物質，介入人的主觀感知。邁向綜合世界資本主義（Integrated World Capitalism/IWC）時代，物質和非物質大量增產的過程，使得個人和群體的存在主體越來越荒謬。<sup>36</sup>瓜塔里討論的對象不僅日本，還有工業快速發展的第三世界，都面臨著高科技產業和傳統文化的糾葛與衝突。其中義大利和日本卻找到兩種文化共生的可能性，成功將高科技產業嫁接到集體主

<sup>34</sup> 同前註。

<sup>35</sup> Félix Guattari, *The Three Ecologies*, p.43.

<sup>36</sup> Ibid. pp. 44-46.

體，同時與遠古文化保有互動。<sup>37</sup>借鑑此觀點看董啟章小說中呈現過往至今的香港文史，就別有寓意。香港受到英國殖民現代性的影響，各種經濟和科技產業發展快速掩蓋過城市人原本的華人傳統文化生活；董啟章在《博物誌》描述香港具有這種「既先進，又存古」的文化特徵。

「異地」這輯，顯然是將空間作為描繪空白主體的中心，以魔幻寫實的手法呈現香港地方生態的特異性；並且循此空間擬造出相應奇異的環境狀態，但同時透過人物的行動與抉擇來傳達作者理想的自然觀，由此構成他的「怪異敘事」。〈貝〉是全書中唯一點名香港具體地標的一篇，故事講述羅生與貝貝在吐露海灣一大片重金屬廢料佈滿的海床，發現百個外觀如複製的巨型貝殼，每顆貝都含有一樣的珍珠，無法辨識哪個是原始貝。<sup>38</sup>指涉英政府為了牟利罔顧生態，而在「吐露港」（Tolo Harbour）建造科學園區，為了巨大明亮的珍珠，人們可以破壞自然秩序不斷科技基因複製，而使物種失去原生獨特性。而〈竹〉則化用芥川龍之介〈竹藪中〉（藪の中）<sup>39</sup>無人可見的慾望、犯罪空間影射「V城」被掩蓋的黑暗社會空間：

鐵柵似的竹子把你關在外面。你聽見呼叫，但你無法看透內裡的秘密。於是你只能夠幻想，在不同的季節，你在竹林中看見的，其實是相同的事情，包括交配和謀殺。<sup>40</sup>

多篇文章提到「V城」有著「小人化」的政治政策，卻沒有明確說明這個計畫將如何進行，只記述它在城內所引發的後果。這種無可確知的城市政策，及憂心未來而焦慮的社會氛圍，影射了港人對英殖政府執政，或回歸後港府決策的不信任感。西西的「浮城」系列，明顯表現這種感觸，董啟章也承繼下這種城市基調。〈桃〉描述「V城」本來有自己的歷史，但這個「史」將無以為繼。女主角灼灼像夸父一樣不斷奔跑，

<sup>37</sup> Ibid. p. 63.

<sup>38</sup> 董啟章，《博物誌》，頁31。

<sup>39</sup> 日·芥川龍之介，〈竹藪中〉，《羅生門》（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

<sup>40</sup> 董啟章，《博物誌》，頁43。

最終跑到一片桃花林，「歷史發生小人化之後，一直荒廢，桃樹或死，或野生。」<sup>41</sup>沒有像其他姐妹以賣身換取自由，而順應自身情慾未婚懷孕的她，只能蜷曲在巨桃裡，等待夜晚降臨。董啟章援引《詩經·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以少女暗喻香港被殖民者播種，眼見果實既已成熟卻無法「宜其室家」的悲傷；但有「桃」得以藏身，港人似乎還能仰賴這個短暫的果實，保護自我一段時光，等待未來回歸的黑夜降臨。桃果易爛，與「逃」雙關，這也隱藏著作者對V城悲觀的未來想像。我們不曉得「V城」如何進入「小人化」的時代，但人們生活環境明顯有了變動。〈鼠〉改寫《詩經·魏風·碩鼠》為一則動物寓言，描述「小人化時代」下，人們以興建「大鼠樂園」為願景，投注高經濟價值產業；有些在地原本的工作與價值被迫失去：「小人化之後，園主都改種禾麥，效益高。阿木於是就失了業。……只要大鼠高興，決定留在我們的城市，就不愁沒工作做了。」<sup>42</sup>主角對此不置可否，只感覺「大鼠群竄過林木，漸漸逼近的聲音」和即將改變的「V城」；這裡以「大鼠」影射新來的掌權者，寫實隱喻香港回歸後的環境狀態。

與此同時，其他生物當然不只象徵「外來的他者」，小說也透過描述這個城市實施「小人化」政策之後的現象，從中形塑人與其他生物之間可能的衝突和融合想像。人與生物之間本來的關係因此產生轉變，形成一種「非常態」的奇妙狀態，使「V城」成為一種「異地」。人變小，意味周遭自然生物的存在主體被相對放大，在這個環境裡，人與生物之間，是否還能維持「小人化」之前，「以人為中心」的生態秩序？這裡的生物形象就不停留在對外地人的「物化」指涉；而是轉向思考人和生物之間的共存關係。〈蜻蜓〉和〈蝴蝶〉兩篇敘述巨大的昆蟲如何造成人們恐慌，從而引發城市失火，陷入混亂；仍然「有人還開始研究如何

---

<sup>41</sup> 同前註，頁 27。

<sup>42</sup> 同前註，頁 29。

利用蜻蜓做交通工具。」<sup>43</sup>引發恐慌的蝴蝶「其實什麼也沒有做，不過在那裡飛而已。」<sup>44</sup>傷害人的，始終都只有人。「小人化」政策看似傷害V城人過往的生活，卻也使人們開始思考未來與他種生物共生的可能性。在〈白海豚〉裡，擱淺倖存的白海豚，最後與V城人結婚，成為樂樂的母親，<sup>45</sup>在小說裡，人與生物之間，甚至可以共同繁衍後代。這可以看成是一種環保意識提升後的象徵神話，也透顯董啟章在小說敘事背後的生態思維，和跨界共生的價值觀。

在「異地」裡，人們總關注著海裡浮沉的島或城，延續西西的「浮城」意象，《博物誌》透過記述「異地」的聲音，傳達對於本地的歸屬感和未來存身的想像。〈海星〉講述天地突然倒轉，但「世界對這個轉變沒有什麼反應，一切如常進行，高樓繼續建設。」<sup>46</sup>敘述者「我」常和人們說倒轉的事實，始終沒有人察覺，這一度讓他動搖；他最後只選擇躺在海底空間，仰望夜空般的海面看到一顆星，以孤寂美妙仰躺在自然界的感觸來確立自身存在。另一篇〈鶇〉也傳達出重新發現「本土」的驚喜。「我」首先自白：「從前當我也是低著頭總覺得世界上沒有比自己的事情更重要的路人之一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有鶇這種鳥。」<sup>47</sup>當他無意間被鳥啄食漿果的樣貌吸引，才發現這種鳥在本地很普通，文末一句「也許，就是這種鳥呼喚了我吧！」表示「我」因為在地的原生生物而喚醒對土地的關懷，與其他篇反思過於「文明」的城市生活相參照，呈現一種擁抱自然的慾望。這在〈地衣〉這篇，批判文明（包含文化裡無所不在的英殖痕跡）對當地自然的破壞暗示尤其明顯。敘述者「我」跟著阿耳進入大學附近的幽深山谷，兩人褪去外衣裸身安睡在樹叢，即使已遠離人間，但他腦海仍然讀到一片形似英文字母的地衣，「我一看見書本上的文字，腦海就浮現那令人噁心的文字衣，然後就會想起努力

<sup>43</sup> 同前註，頁 33。

<sup>44</sup> 同前註，頁 45。

<sup>45</sup> 同前註，頁 25。

<sup>46</sup> 同前註，頁 35。

<sup>47</sup> 同前註，頁 39。

讀著文字衣秘密的阿耳，和他徒勞的人生。」<sup>48</sup>引「我」進入山谷的阿耳在最純粹的森林應該是安樂的，但當象徵文明的「文字」侵入地衣後，卻為他帶來人生的煩惱與徒勞。而植物地衣長成英文字母的形象指涉，就落實在對香港實施英語教育，從而改變港人認知態度的人文環境隱喻裡。因為「文字」和語言體系的規則掌握了人文學科、知識構成與參與文化生產的權力；哈洛威（Donna J. Haraway, 1944-）評論巴拉許（David Barash, 1946-）的社會生物學時認為，專家之所以有權威，是因為他們「能夠透過對字的知識、對硬幣的控制、破解自然神秘聲音的密碼，對自然施加有效的權力。」<sup>49</sup>對於一代香港人而言，通過人文教育建立自我認同的歷程跨不過語言基礎，但這個基礎本身就隱藏另一種非自然的權力，影響著學習者的一生。董啟章對英語的反思，同樣可見於《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裡，對敘述者「我」影響甚深的《圖解英漢對照詞典》，以及最初以《天演論》和《物種始源》來建構理解世界的知識框架。掙脫權威聲音，就是與它自身接受的知識建構相辯論；在《博物誌》時，董啟章只是先透過故事呈現某種弔詭情境，並提出質疑，而這些都在其後的「自然史三部曲」被大為解構。

就瓜塔里而言，正是在小說這種具有創造力的美學中，這種反既定文明的象徵可以存在，並且得以從主流聲音逃逸；他假設「如果一個新的生態環境是可能的，那麼它預示著人類將重新建構自己在各個領域的實踐活動，通往一場個人或集體的重新特異化。」<sup>50</sup>董啟章的小說一直在做這樣的嘗試，他將個體不斷透過特異化的主體化過程為「香港」賦予各種意義，從而讓香港也成為「異地」。穿梭在各種「異地」間的敘述者「我」，總體來說，傾向從資本主義社會主流逃逸到自然；並從現

<sup>48</sup> 同前註，頁 41。

<sup>49</sup> Donna J.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and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1), p.74.

<sup>50</sup> 黎子元，〈瓜塔里的生態智慧：從資本主義世界到香格里拉的線路〉，「香港 01 Dialectica 當代哲學專欄」，2017/06/19。http://www.newmaterialismsociety.com/guattari.html。2021 年 5 月 17 日作者讀取。

狀的覆滅中寄與新生。除了人類娶白海豚的奇想之外，在〈柏〉中，「我」感覺「在平坦的海床上，整齊並列著高聳的柏樹……它們會在那裡等我。」<sup>51</sup>敘述者即將成為生物圈的一員。由此可見，《博物誌》藉由描述「異地」各種「異象」，慢慢形構出一個人和物融合共生的空間。〈白鷺〉更具體描述城市東北接近邊界的地方，人與白鷺在整個空間、身體的意象上若有似無的重合：「在我們交換了一整晚的空氣中。我們混合了的味道。還有那重疊的體溫。」<sup>52</sup>最後透過「我」表述：「我想。我們應該在這裡。」<sup>53</sup>為自己劃下定位。

《博物誌》這樣一本充滿動植物與人交疊意象的小說，怎麼看待它作為「V城系列」的壓軸，以回應作者最初想抵達「未來考古」的書寫意圖呢？「異地」最後一篇〈紅樹〉寫著，勘察隊終於發現被樹林遮蓋的小島：

我們嘗試用望遠鏡在茂密的樹林下尋找城市的遺跡，比如說，從前的高塔、摩天大樓，或者山頂上的建築物，但也徒勞無功。看來島上從前的景觀已經完全湮沒了。<sup>54</sup>

從敘述推斷故事發生在城市歷經高度文明浸染覆滅後，被紅樹覆蓋，看似回歸原始狀態，實際上故事時間是往未來推進的，在這個特殊的城市空間，歷史成為反覆循環的自然時間，也為這個「異地」奠基下既自然又科幻的未來素質。

## （二）異人或異物：人、物互涉呈現的港人心靈圖景

確立「異地」的空間性質之後，「異人」和「異物」這兩輯應相互並陳分析，作為整體參照。就內容來說，皆可看到許多「物化的人」以及「人化的物」；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之「物」仍為有生命之動植、物，

<sup>51</sup> 董啟章，《博物誌》，頁23。

<sup>52</sup> 同前註，頁37。

<sup>53</sup> 同前註。

<sup>54</sup> 同前註，頁47。

後者皆為消費性物質（或食物）。兩輯寫作手法相似，都通過一些被異化的人物形象，以性質混淆，模糊人、物之間的界線，來表現在香港環境各種少數族群異質的生命型態與困境。前者是被人類世界排除在外的「異人」；後者則是自願「被物化」的新時代人類，這兩種「物」都指向不同族群香港人的心靈狀態，作者從「物」的立場反寫這些人「異」的狀態，透過將少數族群「特異化」的書寫來建立他們的「主體聲音」。誠如哈洛威將女性、猿猴與賽伯格、怪物都視為「同伴物種」，她強調意識的覺醒並不僅是單純的認知現實，而必然涉及特定的觀看位置與理解觀點。因此「虛構和現實並不是對立的，而是在對特定認識對象的建構中混雜交融的。」<sup>55</sup>董啟章小說裡的「異人」和「異物」需置於這樣的脈絡下，來自非主流的批判主體才能得以建構。

這個「異」也扣回全書前言〈影樹〉所提及的「眼」；「異人」是象徵從一種新的眼光，去發現世界。寫在〈銀杏〉裡的師父，作為觀察「城市自然」異象的指導者，他說「要做一個真正的聽樹人，就得先放棄你的眼睛」，<sup>56</sup>敘述者「我」循著師父指示，「看見高處的樹葉間，彷彿掛滿了銀杏果一樣的師父的眼睛，堅硬的，發出令我的耳朵疼痛的剝裂聲」<sup>57</sup>師父把自己的眼睛埋入土裡，卻從與植物融合的新形象裡，獲得全新官能體驗。這樣超現實的意象，象徵著作者透過志怪敘事拋棄以人為中心的秩序，嘗試從一種神話寓言式的敘事語言，描述空間裡萬物交錯的生活。文本表現出人們因現代生活環境而改變的存在意識及生命型態，就瓜塔里的說法，是「不可能以傳統政治去反對來自外部的資本主義，所以必然要面對資本主義在日常生活對人們心理生態的影響，包含個人、家庭、物質與道德。」因為大量資訊與物質的變異，使得人們生活的新生態實踐，不得不在多重異質的前沿上表達自己，因此應該

<sup>55</sup> 張君玫，《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新北市：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6），頁 27。

<sup>56</sup> 董啟章，《博物誌》，頁 61。

<sup>57</sup> 同前註。

將常規化之外的徵狀和事件視為「潛在的主體化工作」；透過讓他們參與異質性（heterogenesis）的過程來形成可能的主體樣貌。<sup>58</sup>由此角度分析文本裡「異人」與「異物」的描述，就能體會到董啟章意圖呈現香港生態各種潛伏在主流之下的異質主體聲音；他們正通過這種「異」去傳達環境與自身的互動關係，並且傳達自我主體需求。

如〈冬青〉與〈蕨〉都在寫被拒於群體之外的「異人」。〈冬青〉裡因膚色和飲食習慣與眾人不同而被歧視的女孩，獨自跑入一片冬青林，最後「丟下書包，褪去白裙，張開雙臂迎向陽光，全身嫩綠。」<sup>59</sup>而〈蕨〉裡的羊齒之女，所經之路被孢子和蕨類植物覆蓋，人們與市政府因此排擠她，甚至禁止她參與城市運動會；他們雖然「發誓要永遠追隨羊齒織女的綠色足跡。」<sup>60</sup>但現實是，除了陰暗之處，太陽曝曬的地方終究難容脆弱的羊齒之女；她被排除在政府主導的秩序之外。〈南猿〉則諷刺某些人為猴子，「老頭就作興把報紙的副刊遞給那人。那人也無說話，……若無其事地瀏覽那印有裸女的黃色版。」<sup>61</sup>把人當猴戲耍的老人，把麵包像餵猴子的方式遞給那人，最後口中卻也嚼著同一塊車輪包；文本同樣也反諷文化菁英者的傲慢，實際上兩人都生存在同一空間，吃同樣的食物。小說隱然拋出一種提問：如果取消了「人」與「猿」的區分，「人」和「植物」的界線，主流與少數個體會有對等共存的可能嗎？如果另外有一類少數，他不跟隨商業文化而戀慕古史，他又將變得如何？若「V城」的歷史或文化有某種根柢，它來自哪裡？〈白千層〉與〈樟樹〉裡描寫的「樹人」試圖回答這些疑問。在〈白千層〉裡，每天都得脫皮的主角家家，努力尋找造成身體病變的原因；她想找尋記憶中那種古老的植物氣味，卻只能找到「沒氣沒味的瘦弱洋紫荊」<sup>62</sup>〈樟樹〉則敘述小章失蹤之後，在一口他鍾愛的古老木箱子裡發芽生根，箱

<sup>58</sup> Félix Guattari, *The Three Ecologies*, pp.50-51.

<sup>59</sup> 董啟章，《博物誌》，頁 51。

<sup>60</sup> 同前註，頁 57。

<sup>61</sup> 同前註，頁 65。

<sup>62</sup> 同前註，頁 53。

子裡有很多代前人留下的東西；直到外面房屋毀壞倒塌，這棵箱子樹卻越加茁壯，生出花果，「搓碎葉子，有從前小章身上的香氣」<sup>63</sup>洋紫荊是香港的市花，它象徵著從兩種不同植物雜交出來而無法繁衍的花，對於要追尋古遠歷史的尋根人來說自然「沒氣沒味」；因為它是歷史偶然發生的產物，未來再也沒有同樣模式和再生的可能性，就像香港。戀古的人只能化作一棵樹，以生命護持、滋養那口代代相傳的古典木箱，並且從中累積成新生。文本傳達出在這種環境氛圍中生活的人總是迷惘；〈羊與虎〉裡的敘事者說：「我是一隻迷失的羊，我只不過盼望毀身於一頭真正的老虎。」<sup>64</sup>畢竟現實沒有把他們吞噬，只是留下一個彷彿更糟的前景。從「我」養了一條象徵亞洲四小龍香港的「小龍」，<sup>65</sup>走失一條屬於香港作家李碧華創造的「青蛇」<sup>66</sup>只尋到傳統的白蛇；<sup>67</sup>且豢養一隻在體內築起陷阱的「蜘蛛」，作為「香港」近似「蜘蛛精」<sup>68</sup>既魅惑又危險的慾望吸引等隱喻，<sup>69</sup>都不難讀出敘述者「我」的香港特徵，那些隱藏在香港文化裡若隱若現的中國古典文化符碼，既美麗又危險，暫時只能龍蛇雜處的養著，與之共存。在「異人」最後一篇〈藻〉，則又從人的世界回歸到對環境污染的反思。敘事者「我」把憂鬱的綠藻小子帶回家洗澡，綠藻小子先露出俊俏男人的身形，不久分解成一攤綠水從浴缸口流去，只留下小藻絲。「異人」這輯以兼有動植物性質，跨越兩者分界的「藻」為收尾，暗喻所有生物在這樣過度開發、污染的生態環境的結局，「我」做了一切挽救的努力，但最終只能「把小藻絲放進

<sup>63</sup> 同前註，頁 55。

<sup>64</sup> 同前註，頁 63。

<sup>65</sup> 同前註，頁 69。

<sup>66</sup> 隱喻李碧華將《白蛇傳》改寫為具香港特色的《青蛇》。李碧華，《青蛇》（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3）。

<sup>67</sup> 董啟章，《博物誌》，頁 71。

<sup>68</sup> 劉以鬯曾將《西遊記》盤絲洞一節改寫成新編小說〈蜘蛛精〉，最後唐僧正視了自己的慾望。該短篇小說收錄在劉以鬯小說集《迷樓》。劉以鬯，《迷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

<sup>69</sup> 董啟章，《博物誌》，頁 73。

口中，流了一滴有重金屬味道的眼淚」，<sup>70</sup>無論環境再惡劣，眾生只能承擔苦果。「異人」這輯所描述這些半人半物的生物，都各自處於他們非主流的位置與心靈狀態，一一投射出香港在種族、文化和環保不同層面的生態議題，而成為一個香港當下生態的微型寓言。

接著「異物」這輯，則具體透過文學描述，體現阿萊默在《身體自然：科學環境和物質自我》提出的「情動身體」概念。阿萊默將「身體」視為主體與環境互動的節點、中介或介面，而將人類身體與（非人或）自然身體之間的連結、糾纏和轉換，以及這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視為「跨身體性」，環境因子和物質能量穿越其中，影響身體的能力（失能）、（不）健康和生命表現。因此「身體存在環境之中，環境也存在身體之中」<sup>71</sup>在「異物」裡被物化的人，通過物質化的身體變形，呈現浸染在香港高科技、物質化與高度消耗資源的社會環境中，改變自我生命形態的生活樣貌。〈克力架〉、〈鳳梨酥〉和〈粟米〉<sup>72</sup>三篇便透過變形的巧克力先生、鳳梨酥小姐，把人對食物的喜好與戀人互動模式相對應，表述香港飲食男女的愛情關係。特別是〈粟米〉表面上寫恐怖情人，實則表現出人類對環境、糧食需索無度的慾望提出批判。「我」和粟米君交往一年半便使得他窒息昏厥，他的左胸只剩下「一根整齊的，摘光顆粒的粟米心」<sup>73</sup>。粟米先生掏空了真心，「我」卻始終懷疑他吝嗇、暗藏起其他糧食分送他人，粟米先生說：「總有一天要吃完的」，人類總是要榨乾一切自然的資源，才驚覺那個額度原來這麼近。人與人如此、與食物和環境，都是如此；尤其在香港這樣高度消費浪費的環境中，需留有餘裕，才能永續。

〈霓虹光管〉與〈帽子〉則是以「霓虹燈管人」與「帽子人」的形象，指涉兩種極具都市特徵的族類，前者是鑲嵌在身體外觀的霓虹燈光

<sup>70</sup> 同前註，頁 77。

<sup>71</sup> Alaimo, Stacy. *Bodily Nature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Self*. 引自蔡振興，《生態危機與文學研究》，頁 23。

<sup>72</sup> 「粟米」為粵語的「玉米」。

<sup>73</sup> 董啟章，《博物誌》，頁 83。

掩藏不住情慾，但感情不持久的人們；<sup>74</sup>後者是以帽示人，卻將帽子變成頭蓋骨的人們，面對最親近的人也戴著不同帽子，見不到赤裸的思想。<sup>75</sup>這一類結合物質的人物形象幾乎是「異物」一輯的描述重點。與其說是異「物」，更近於描述人的生活型態。當中透過「因物質而異化」的人物生活，強調倫理和人文關懷，並非如志怪傳統，是對見聞感到驚異而記述，而是透過「志怪」形式偷渡作者評價，並試圖從「異物」的常態化中，找尋與變異族類共存的可能性。比如燈泡小子的雙眼之所以變成一對燈泡，是因為製造者敷衍了事，因為「旋上一對燈泡要比設計一對眼睛容易得多。」<sup>76</sup>人們只在乎外觀形象相似即可，並不在乎被設計者本身的感受。小說設想這些被製造的「人」有情感和慾望需求；於是安排同樣擁有燈泡身體的戀人為燈泡小子化解困境。而將身體改造成打火機的人，雖然遭遇不少日常困擾，但最終將打火變成謀生技藝，達到名利雙收的境界；<sup>77</sup>這些「異物」在人群中的成功，顯示並非所有異質的個體都將被排除，小說仍然為它們保留了一些安身之處。

收錄在「異物」裡的文章，最後收在反思科技進步與人文之間的衝突關係。〈筆〉描述一個左手天生是一支鋼筆的人，他勤於抄寫手稿，立志成為作家，但卻屢屢被退稿，原因是「現在的作家已經不再用筆寫字。」<sup>78</sup>雜誌社只收電腦打字稿，傳統文化人被文學媒介的新形式阻擋在外。文化以電腦大數據生產和傳輸資訊，也滲透人們生活，因而在〈磁碟〉裡，它就變成了「磁碟嬰兒」。這個嬰兒的產生現象看似很科技，實踐形式卻很古樸：

磁碟嬰兒的父親總會在電郵裡寫情信給磁碟嬰兒的母親，……她就  
就把這些電郵儲存到磁碟上去，然後把磁碟吃掉，細細咀嚼好像

<sup>74</sup> 同前註，頁 105。

<sup>75</sup> 同前註，頁 107。

<sup>76</sup> 同前註，頁 93。

<sup>77</sup> 同前註，頁 109。

<sup>78</sup> 同前註，頁 101。

人家吃一塊塗了果醬的全麥麵包一樣。這樣，她就懷了磁碟嬰兒。<sup>79</sup>

老派愛情模式在新時代被置換成新媒介，但愛情的日常實踐如進食般輕易；人們透過社群網絡和電郵談情，從數據紀錄累積彼此的情感，磁碟嬰兒熟知兩人所有的情書往返，是名副其實的愛情結晶。作者其實更想問，資訊爆炸的時代，要怎麼讓容量有限的「磁碟嬰兒」持續「存活」？格式化等於放棄記憶，會不會我們的人生其實只需要一張磁碟的內容就足夠生存下去呢？科技日新月異持續改變人們生活型態，〈真空管〉敘述一個能聽到所有電波的真空管丫頭，驚悚之處不在於她能探聽周圍環境所有的廣播或電話訊息，更在於她能讀到人的腦電波；<sup>80</sup>文本似乎也懷疑科技是否真能讓人更加自由，或反而失去隱私。顯然在大數據綁架用戶資訊的今日，這個質疑更為具體。

此外，我們可從〈錶〉與〈鎖〉這兩篇文本中觸及「自然時間」與「心」的議題，來分析作者在極度被現代機械時間支配的生活型態裡，試圖打破理性秩序，回歸感性的狀態。「鐘錶」在小說裡的象徵與「現代時間」和「城市精準作息」相連，〈錶〉一文中，從不戴錶的錶王體內有最準確的生物時計：「錶王靠他的本能，知覺到一切時間的來臨和終結，有條不紊，順應著身體的指揮，自然的秩序。」<sup>81</sup>錶王具體呈現那些把「現代時間」精準內化的城市人，他的自然秩序和前述將磁碟當吐司吃下的女子一樣，都呈現出已然融入「城市自然」節奏生活的樣態。即使如此，高度內化「現代理性」的錶王，最後仍然因為戀愛打亂他的節奏，使他腦袋的錶再也無法動彈。而另一篇小說〈鎖〉裡總是為他人開心鎖的鎖匠，最後把萬能鑰匙送給少女，只留下一把小鎖，不時打開自己的心臟，清清東西。<sup>82</sup>基本上也採取回歸最簡樸的態度面向自身。

<sup>79</sup> 同前註，頁 91。

<sup>80</sup> 同前註，頁 113。

<sup>81</sup> 同前註，頁 87。

<sup>82</sup> 同前註，頁 97。

綜上所觀，「異人」和「異物」這兩輯有補述的作用；「異」是相對於「常」所產生的。在「異地」裡出現的「異人」與「異物」反映的正是「V城」常態；透過上述分析可知，作者藉由「物」具體融入「人體」來表述現代城市人已然「異」化的生命形態，由此展演「V城」不斷向前發展所改變的人、物和環境生態歷史。若細查此類敘事的「異」，顯然作者有所依託。「異物」這輯，最後以〈地氈〉這篇傳達作者建構「博物」敘事的基礎：

地氈婆婆躺的地氈都是她的作品，當中展示了非常高超的編織技巧，以及包含著神奇暗示的圖案。不過，從沒有人能細心讀到地氈婆婆的地氈語言……就算是能夠仔細讀到，相信他們也沒能讀懂吧！<sup>83</sup>

董啟章以這篇向《飛氈》的作者西西致敬，自喻如何把現實觀感的秘密，鑲嵌在文字編織物裡，形成一種亂世氛圍的隱微修辭。<sup>84</sup>通過小說的藝術形式，傳達對香港文化、生活環境的各種反思與理想。董啟章《博物誌》裡關於「異人／物」的表述，不僅承繼古典小說敘事形式，同時吸納香港本土小說家的創作養分；在全球環保意識高漲的新世代，重新以一個人、物主客體互換，甚至交融的方式，呈現現代香港社會展現各種回應物質、科技和環境現實的主體化過程，再次將過往以人文思維為中心的「香港史」翻新，以香港物態環境寫史，傳達社會關懷。

### （三）陳「事」奠基「城市自然」：下啓「自然三部曲」

在最後「異事」和「私事」兩輯，實際整合前面幾輯思考，重複前述本文提及幾個社會面向，總括各式議題，把人與物（尤其是自然生物）的結合形式更推向極致；最後在「私事」裡，回到描述家庭、夫妻和童年的體己故事，使整部《博物誌》落在一種歸屬自然的明亮期待。最後

<sup>83</sup> 同前註，頁 117。

<sup>84</sup> 西西，《飛氈》（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6）。

一篇〈合桃〉與〈地氈〉當中的隱微修辭呼應，主角用心記憶、感受合桃在她生命裡存在過的一切：

她很清楚地記得它的形狀，那兩半合成的桃肉，也記得它的顏色，肉白的，像赤裸肌膚的顏色。當然也記得它的味道……那曾經是她那麼享受，那麼親密地分享著的感覺，現在卻藏在堅硬的、厚實的桃殼裡面，沒辦法再打開了。<sup>85</sup>

曾經最平易自然的狀態，在某些情勢改變之後，它彷彿變得在這個時機點下再也不可得，但是作者卻寫了：

把合桃放在耳邊搖搖，的確還聽到裡面的聲音，心是在的。<sup>86</sup>她雙掌撫摩著合桃的紋理，心中就一下一下地抽搐。也許，有一天她是會有決心破開它，拿出那二十六顆核桃來的。<sup>87</sup>

我們無法確知「那二十六顆核桃」是否指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六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法規，<sup>88</sup>但綜觀《博物誌》裡「異地」引用詩經寫成的那篇寓言〈桃〉對照來看，「桃」作為香港的隱喻確實十分明顯。這樣的「V城」即使歷經各種歷史變革、消費物質、數位科技和政治威脅各種因素影響，在多篇故事裡仍透顯一線生機，顯示敘事者還懷抱著對這片土地素樸的「本心」。誠如趙稀方對西西小說的觀察，對應董啟章的小說情況類似，「肥土鎮是一個虛構的地方，因此西西所提供的細節愈真實，其荒謬性越高。」<sup>89</sup>這個敘事特徵在《博物誌》中，透過「異」的敘事手法影射現實各種荒謬情境，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sup>85</sup> 董啟章，《博物誌》，頁181。

<sup>86</sup> 同前註。

<sup>87</sup> 董啟章，《博物誌》，頁181。

<sup>88</sup> 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網頁，<https://www.basiclaw.gov.hk/tc/index/index.html>。2020年7月10日作者讀取。

<sup>89</sup> 趙稀方，〈香港：看不見的城市——讀董啟章的《永盛街興衰史》和《地圖集》〉，《文學評論》第26期（2013.6），頁39。

通過「博物」書寫，董啟章把對香港的觀察納入一個龐雜的物體系，構成「V城」的歷史與未來，其後長篇鉅製「自然三部曲」中關於主要角色，諸如耳朵有真空管的龍金玉、心臟是機械鐘維真尼亞，以及即物成人的栩栩都能在〈真空管〉、〈錶〉、〈鎖〉、〈磁碟〉等發現「人一物」合體的雛形。從「自然三部曲」第一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目次安排，由羅馬字標目的物質標記「收音機、電報／電話、車床、衣車、電視機、汽車、遊戲機、錶、打字機、相機、卡式錄音機」對照阿拉伯數字標目與生命相關的哲學主題「蘑菇與人物的誕生」、「蝴蝶餅與耳朵」、「天使髮與人物法則」、「結他弦與個性」、「棉花糖與夢」、「仙人掌與生命史」、「螺絲帽與性」、「珍珠與救贖」、「音樂盒與我」、「真實世界」、「想像世界」、「可能世界」從整體結構中考察這兩條敘事主軸，可見董啟章在書寫邏輯上承繼著《博物誌》裡「異人」、「異物」以來的思考，把形制發展得更為龐大完整，最後收束在敘事者個人的幻想時空。《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開篇〈蘑菇與人物的誕生〉也同樣呼應《博物誌》「私事」裡〈草莓與蘑菇〉最後變成蘑菇的敘事者「我」，<sup>90</sup>到這裡變成虛擬人物「栩栩」重生，開始一段舊新交混的人生旅程。其中構設出來的「人物」世界，更具體呈現「人一物」合體的賽伯格（cyborg），以虛構的時空和人類現實時空作為參照；產生「人物世界」與它們自己的生存法則。哈洛威在《猿猴、賽伯格與女人：重新發明自然》一書中，把結合有機體和機器的混種造物「賽伯格」和猿猴、女人並置，說明在既有的科技、生物學論述中他們都處於「邊界」而形成「怪物」；然而，正是這種身處多重邊界跨越的視野，打開自然史重新被敘述的可能性。作為被創造的物種，它們並非女人所生，並拒絕受害者的意識形態，他們擁有真實的生命；並且主動改寫身體與社會的文本，這場閱讀的戲局賭的是生存。<sup>91</sup>這個試圖從小說想像

<sup>90</sup> 董啟章，《博物誌》，頁163。

<sup>91</sup> Donna J.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pp.2-3; p.177. 參張君玫譯，《猿猴·賽伯格和女人：重新發明自然》（臺

撐出「怪物」生存空間的前戲，在董啟章的《博物誌》已預先做好鋪排，並且這種「畸零個體的多元政治」概念也在《物種原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中被擴寫得更為完整。

值得注意的是，董啟章將《博物誌》的英文書名訂為 *Unnatural Re-collections*，這個題名正隱藏著作者對於「自然」和「非自然」定義的審視與辯證。如果在《博物誌》裡，董啟章建立的是一種「志怪」的視閥，在「自然史三部曲」他便要進一步透過小說辯證，怎樣是「怪」，而什麼才是「自然」；並試圖通過小說解構科學意義的自然，重新鋪展自己的「自然史觀」。《物種原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整部小說設計為一個生活在V城的畢業女大生芝芝（又名貝貝）記錄過往參與的讀書會、政治參與，和感情生活，通過讀書會和護樹運動，去思考辯論「性別」、「怪物」、「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以及「體制、自然與歷史」之間的關係。整部小說裡的讀書會成員有自我認同為女性的男人、自我認同為男性的女同性戀者，呼應他們讀的第一本書大江健三郎《燃燒的綠樹》的陰陽人主角；讀書會成員與書中角色都是社會正常定義中被排除的「怪物」。他們從閱讀、討論薩拉馬戈《盲目》中社會失序的生物性，佩索阿詩中無法整全、必然片段碎裂的個體，梭羅《湖濱散記》，阿倫特《人類的境況》談個體自由的公共參與空間，從薩伊德《論晚期風格》談阿多諾與藝術的不合時宜，巴赫金《拉伯雷及其世界》對等立場對話的複調聲音；並從嚴復翻譯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為《天演論》，將自然科學的分類化為與「天」同道的思維，在讀書會中展開一連串「個體與世界」關係的自我啟蒙。這份書單從理論批判單一價值的體制、形成認同多元並存的自由意識，到開發地護樹行動的抗爭中，實踐他們的「學習年代」，尤其社會運動的抗爭事件對照2010年香港多起社會運動，這個隱喻更直指現實。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自我懷疑的自然科學研究者阿角。他在參與讀書會之後，熱衷鑽研起文學與哲學，寫下大量筆記，批判文明意義下的抽象科學割裂人與自然之間整全的互動關係，他是唯一在整場政治活動中，從樹的本位批評團體內部「沒有人理那棵樹的死活！」<sup>92</sup>的人，甚至為了護樹運動賠上生命。董啟章透過阿角這個角色對歌德《威廉·麥斯特的學習年代》的熱愛，構成小說核心；並且對歌德的自然史觀有這樣的詮釋：

歌德在生物學上所做的形態學研究，不是靜態的割裂的分類學，而是局部和整體在生物的演變過程中的形態研究。當中有時間的向度和空間的向度，而兩者是融為一體的。<sup>93</sup>

阿角抄錄大段歌德英譯本的節錄文字，並在遺書中寫道：

人類作為一個物種，不但已經到了自我毀滅，也到了連同它所寄居的地球一同毀滅的地步。經過漫長的演化，人類發展出高度的文明但人類還未能控制自身作為動物的暴力性。相反，暴力以文明的形式擴張覆蓋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個人在地球上要尋找一塊真正自由的土地，已經不再可能。<sup>94</sup>

無論是在書名對於歌德「學習年代」的復刻，或者對於當中人與自然關係的重新定義，可以看到董啟章從《安卓珍尼》雌雄同體的生物性徵、《雙身》的變性人到《博物誌》的「物化人」，乃至於「自然三部曲」中前述社會畸零人的總和，通過不斷辯證、打破既有學科分類的生物知識，重構歷史時間、空間，提出新價值的創作實驗，和無間斷對於人類生態和自然哲學提出相關議題思考。它不僅是人類的性別問題和環保意識，甚至把「人」從論述中心移除，將人與萬物放在平等的尺度，重新思量、質疑「物種起源」的內部論述。

<sup>92</sup> 董啟章，《物種原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471。

<sup>93</sup> 同前註，頁361。

<sup>94</sup> 同前註，頁693-694。

王德威沿用馬克思理論的觀點評「自然史三部曲」，將香港置視為一個殖民背景的資本主義城市，分析董啟章小說中如何以人、物難分的形貌呈現「物質與物化」在交換網絡的密集結構中形構香港的感覺結構；並認為董啟章的小說「不以國族歷史為重點」，而以定義獨特的「自然史」為主要經營的目標。因此就董啟章的小說來看，這個「物」可以是「自然界的總稱，是達爾文物種起源的環境，也是一切創造和被創造物可以發生的條件。」董啟章在解構既有性別、價值和觀念之後，卻試圖建構另一種「物種起源」的可能性，一套呼應「香港」的感覺結構。香港成為董啟章小說歷史的隱喻，甚至成為他想像宇宙生成的隱喻。王德威指出，「董啟章有意暗示他的『自然史』的真諦也許始自單人獨馬的思考，卻終要在人與人、人與世界、宇宙的互動中進行。」<sup>95</sup>此一論點與前述文本分析正好說明本文何以從瓜塔里來談「自然史三部曲」的前身《博物誌》，並證明這種特徵確實在往後這三部曲中開展延續。

瓜塔里談三種生態學的共同原則在於，它們本身就是不穩定的存在，且在實踐過程中逐步分裂和開放，以適應人生存。正是這種戲劇性的開放構成生態藝術的精髓，也關注到身體、環境和族群之間緊密的共同存在語境。<sup>96</sup>他認為這些新創造的主體化只能透過幻想來實現，人們應該學習如何以幻想表達真實生態；這種幻象能透過藝術家表達各種問題的轉移、翻譯和重新部署中起到作用。通過創新實踐，擴展以單一性為中心的替代經驗，通過不斷產生自我主體化的過程，表述自己和社會其他人的關係；並為這樣的暴力幻想創造一個空間。<sup>97</sup>董啟章的小說無論在形式或內容上，都撐出一個幅員廣闊的想像空間來承載作者的自然史觀，以故事形式挑戰既有現實文化生態，形成獨特的生態美學政治。這點尤其可從自然史第一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前言和第一部

<sup>95</sup> 王德威，〈香港另類奇蹟——董啟章的書寫／行動和《學習年代》〉，《物種原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頁 3-13。

<sup>96</sup> Félix Guattari, *The Three Ecologies*, p.53.

<sup>97</sup> Ibid. p. 57, 59.

《時間繁史·啞盜之光》以「獨裁者」作為敘事者自稱，及其作為故事主角「我」第一人稱的敘述設計可以證明。<sup>98</sup>同樣，這樣的敘事形式和小說家現身於香港這樣的金融之都，也有它的文化因素；就像瓜塔里所設定的社會環境，在這個世界資本文化牽動的社會裡，文化菁英擁有物質財富，充足的文化資本和最低限度的閱讀和寫作的餘裕以及能力，而書寫則提供作者合法的決策權，藉由藝術來作為新的審美實踐。<sup>99</sup>這也是董啟章為何要在《物種原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採用讀書會的方式來構造小說，裡面各種辯論最終凸顯了知識份子和文化菁英，選擇以怎樣的方式介入香港歷史，並透過書寫辯論、抗爭來承擔社會責任。

《博物誌》的篇章延續到「自然史」系列第三部《物種原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從前兩章〈一半燃燒、一半翠綠〉和〈用手觀看，用眼觸摸〉可以聯繫起本文前述分析《博物誌》，提到樹木隨目光燃燒的〈影樹〉和〈銀杏〉裡把眼睛埋入地底的「師父」。而在《物種原始》裡的變性人「中」，也寫下了一首名為〈銀杏〉的歌，歌詞寫著：「左右兩半中間相連／是自我一分為二鬥爭／還是二合為一的共生？」<sup>100</sup>《物種原始》最後一章〈比太遲更遲的重新開始〉在魔豆的畫室裡聚集了故事裡的「V城人」，原來《貝貝重生》是魔豆的一幅畫，並且這位擅長畫男女雙身菩薩形象的變性人畫家魔豆「持續繪畫出多幅大型降靈畫，並確立『世界框架』的畫法。」<sup>101</sup>魔豆的原型早在《博物誌》〈羊蹄甲〉中，那個不斷注意扣子與紅花羊蹄甲豆莢，在床底發現豆子的女孩依貝身上早已顯像；<sup>102</sup>《物種原始》的女主角「貝貝」則在《博物誌》〈貝〉中，作為批判工業大量複製的人造巨貝產業鏈，強調應該使貝回歸保存

<sup>98</sup> 董啟章，《時間繁史·啞盜之光》（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sup>99</sup> Félix Guattari, *The Three Ecologies*, p.61.

<sup>100</sup> 董啟章，《物種原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頁166。

<sup>101</sup> 同前註，頁709。

<sup>102</sup> 董啟章，《博物誌》，頁152。

生物自然基因多樣性的原始貝樣貌而存在；<sup>103</sup>可見作者在這幾部小說中間的思維有相互承接連貫的關係。

#### 四、結語：誌「怪」於「自然」的未來想像 ——特異化的香港生態系與共生期許

在董啟章各部小說裡，《博物誌》作為「V城系列」壓軸，並與「自然史三部曲」在創作構思的時間上前後交疊，卻甚少相關研究討論兩者之間的關係。本研究藉由瓜塔里對當代社會提出一種觀察主體形構的哲學思考，分析董啟章如何化用古典小說的神話寓言形式來實踐敘事的藝術美學；藉由《博物誌》開始構思一種新的人、物和環境之間的生態關係，並結合當下香港的政治文化狀態，想像未來各種個體自然共存狀態的可能性。

透過本文分析，可發現董啟章在完成前兩部文人筆記仿擬之後，開始轉向《博物誌》書寫的動機，他所選定轉換的敘事系統已隱含傾向思考書寫「自然」的意味。嘗試建構從香港本土環境產生的「自然」，思考當下現代生活、傳統文史和自然環境在彼此存「異」的情況下，發展成自己的歷史書寫。他選定張華《博物誌》為擬仿框架，選以「異」為其分輯的命名，凸顯出「異」在這整部小說裡有核心象徵。透過對「異地」、「異人」、「異物」、「異事」最後集結在「私事」的分析中，我們能看到董啟章如何通過「異」來表述香港的「常」與「非常」，以寓言體的方式，指涉現實中各種異質人們不得不與環境衝撞、妥協，並尋求與他種生物共存的姿態。這個隱喻到了香港自然史第三部《物種原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則更具體化為讀書會與社會運動，直接投射了作者對於香港公共議題，與自由逐漸縮限的憂慮。但小說人物最後的轉向，似乎也保留對未來新生的可能性。如法國學者拉圖爾（Bruno

<sup>103</sup> 同前註，頁30。

Latour) 認為自然、社會和人與物同屬社會集體，彼此共存，更致力於未來共生的世界。<sup>104</sup>董啟章也透過小說構設的未來幻想中，提供一種人物共生與重生的期許，從《博物誌》到「香港自然史三部曲」撐起的小說世界觀，可見瓜塔里描述三種生態系交互影響的特質：「新生的主觀性、不斷變異的社會、不斷經歷重塑過程的環境」；<sup>105</sup>讀者可以看到董啟章所傳遞的「共生自然史觀」、在歷史中不斷變遷的香港，以及不斷通過小說敘事重塑的V城。正如董啟章在小說借科學研究者阿角之口，闡述對歌德的認同：「真正的藝術如同自然界一樣的合情合理。」<sup>106</sup>在這個意義上，魔豆女孩透過藝術所召喚的降臨，才有了既古老又超越的儀式象徵，而董啟章透過《博物誌》對張華《博物誌》、《山海經》的仿擬，是試圖回歸某種古樸未經文明「破壞」的自然想像。延續到其後「香港自然三部曲」的書寫，都能看出董啟章一方面通過援引古典小說敘事形式，創造新的敘事空間同時，也在改寫過程中建立另一套文化價值觀，重新為香港賦予共生、新生的期待。

董啟章的《博物誌》讓人看到，一個香港的「自然史觀」如何從空間、人和物，以及政策和環境，透過「環境、社會與人類心靈」三種生態系交錯交織所構成異質的多元主體化過程間，慢慢形塑出屬於「香港」的「自然」世界，成為百萬字篇幅鉅製的「香港城市自然史三部曲」前身，從而一步步把香港史從官方歷史中解放，一一歸還於小說所構築的多聲道「香港自然史」世界。

---

<sup>104</sup> Latour, Bruno,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2004), pp.88-89.

<sup>105</sup> Ibid. p. 68.

<sup>106</sup> 董啟章，《物種原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頁 361。

## 主要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0。

【清】劉熙載撰、袁津琥校注，《藝概注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

### 二、近人論著

#### (一) 專書及專書論文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張君玫，《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6。

張君玫譯，《猿猴·賽伯格和女人：重新發明自然》。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0。

梅家玲，《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

葛兆光，《思想史課堂講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5。

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董啟章，《物種原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

董啟章，《時間繁史·啞盜之光》。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董啟章，《博物誌》。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12。

董啟章，《夢華錄》。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11。

蔡振興，《生態危機與文學研究》。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9。

Alaimo, Stacy, *Bodily Nature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Self*.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2010.

- Donna J.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and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1.
- Félix Guattari, translated by Ian Pindar and Paul Sutton, *The Three Ecologies*.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5.
- Latour, Bruno,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2004.

## (二) 期刊論文

- 王德威，〈千年華胥之夢：董啟章、孟元老「夢華體」敘事〉，《漢語言文學研究》第三卷第1期（2012.3）。頁11-18。
- 翁苑君，〈逆轉時間繁史的永劫回歸——談董啟章小說中的循環時間觀〉，《字花》第50期（2014.8）。頁125-128。
- 楊美琴，〈論董啟章小說中的物件人格化現象〉，《國文天地》第二十九卷第8期（2014.1）。頁37-42。
- 鄒文律，〈人與物件的時光之旅——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物（家）史書寫〉，《政大中文學報》第十六卷（2011.12）。頁231-268。
- 趙稀方，〈香港：看不見的城市——讀董啟章的《永盛街興衰史》和《地圖集》〉，《文學評論》第二十六期（2013.6）。頁34-39。

## (三) 會議論文

- 許維賢，〈黑騎士的戀物／（歷史）唯物癖：董啟章論〉，「第二屆北京大學中文系與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聯辦研究生學術報告會」。香港：北京大學中文系與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合辦，2007/5/29。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Working Paper Series研究報告系列。

#### (四) 學位論文

林藍馨，《想像世界的宇宙獨裁者——董啟章小說研究》。臺北：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9。

許聖和，《「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 (五) 網路資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官方網站，<https://www.basiclaw.gov.hk/tc/index/index.html>。2020年7月10日作者讀取。

黎子元，〈瓜塔里的生態智慧：從資本主義世界到香格里拉的線路〉，「香港01 Dialectica 當代哲學專欄」，2017/6/19。<http://www.newmaterialismsociety.com/guattari.html>。2021年5月17日作者讀取。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Li, Jian-Guo, *Tangqian Zhiguai Xiaoshuoshi*(*A history of the tales of anomalies of the Pre-Tang period*).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Ltd., 2011.
- Chuang, Chun-Mei. *Houzhimin de Saiboge: Haluowei he Shibihuake De Pipanshu xie* (*A Critical Reading of Donna Haraway and Gayatri Spivak*)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Co. Ltd., 2016.
- Tsai, Chen-Hsing. *Shengtai Weiji yu Wenxueyanjiu*(*Ecological Crisis and Literary Studies*) Taipei: Bookman Books Co. Ltd., 2019.
- Dung, Kai-cheung. *Meng Hua Lu*(*The Catalog*)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2011.
- Dung, Kai-cheung. *Bo Wu Zhi* (*Unnatural Re-collections*)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2012.
- Dung, Kai-cheung. *Tiangong Kaiwu, Xuxu Ruzhen. (The History of the Adventures of Vivi and Vera)*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Ltd., 2005.
- Dung, Kai-cheung. *Shijian fanshi, Yaci Zhiguang* (*Histories of Time*)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Ltd., 2007.
- Dung, Kai-cheung. *Wuzhong yuanshi, Beibei Chongsheng zhi Xuexi Niandai* (*The Age of Learning*)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Ltd., 2010.
- Donna J. Haraway. translated by Chuang, Chun-Mei. *Yuanhou Saiboge he Nüren: Chongxin Faming Zira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and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1.

---

**The Literary Geology of History:  
Dung Kai-cheung's Natural History and Hong King Allegory  
in Dung Kai-cheung's Novels**

Hsiao-Han Lee \*

**Abstract**

Recent studies on Hong Kong Writer Dung Kai-cheung's "V city" series and the "The History of Nature" Trilogy often emphasize the role of urban space, historical ideology and Hong Kong consciousness. However, the novel *Natural History* (Buowuchi), as a neglected transition between the two series,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for its transition from the humanistic narrative to the human-object entanglements in his later novels.

Taking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borrowing the forth wave eco-theory and Felix Guattari's "Three Ecologies", and the theory of Donna J. Haraway and Stacy Alaimo.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how *Natural History* projects the entanglement of the three ecologies—environmental, social, individual—and the futurity of Hong Kong. This essay on the one hand attempts to interpret his perspectival transition from local, human-centered ethnography to a "Natural-historical Urban-ecology" perspective in his *Hong Kong Narrative*; on the other this essay also wants to take into account his usage of Chinese classics, including *Shanhaijing* and Zhang Hua's *Bowuzhi* as a way to territorialize the nature and thus to respond to imaginations of Hong Kong-ness and to construct a fictional natural-historical world indifferent to the actual world of reason and order.

Keywords: Dung Kai-cheung, Natural History, Eco-writing, Natural History, Hong Kong Literature

---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